

回忆唐耕耦先生的教诲

刘 波

去年11月下旬有一天下班之后，忽然收到国图古籍馆萨仁高娃副馆长转来唐耕耦先生逝世的消息，顿时悲从中来。几年来虽然知道唐先生的身体不太好，不过近期没有听说他病情恶化，一下子传来去世的消息，还是感到有些突然。唐先生的家人不想打搅单位，后事处理完毕，才通知国图的离退休干部处，我们得到消息已经是唐先生仙逝之后好几天了。知道这些，更让人黯然神伤。

我在2008年初调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工作，那时唐先生已经年逾八旬，退休也有十几年了。他偶尔来组里看一看，有时候是借报销医药费的机会，有时候是来找某个资料。同事们都很敬重唐先生，每次他来，都请他坐下休息休息，问寒问暖，聊聊近况。唐先生是上海南汇人，成年以后才到北方来学习、工作，乡音未改，一开始我听不太懂他说的话，只能靠某些能听懂的名词来联想猜测，大概理解他的意思。接触时间长了，才约莫能听懂七成左右。

这些年，我们每年都去唐先生家拜访一两次。每年春节之前，我们照例登门给老前辈们贺年。敦煌学界的其他老师想见见唐先生，有时我也陪同前往。一来二去，和唐先生比较熟悉了，他和我聊得也多了。不管是谈历史，还是论现实，抑或学界旧事新闻，感觉唐先生的思想都没有暮气，他跟得上时代的进步，对新观点也不陌生，表现出难得的开明。讲到激动的时候，唐先生声调激越、挥手拍案，听者为之动容。

唐先生跟我讲过他一生的经历，从早年参加学生运动、建国初期在上海基层政府机关工作，以及后来考到北大历史系求学、转赴山东大学跟随王仲荦先生攻读唐史，还有在社科院历史所、在北图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的工作经历。唐先生经历了20世纪中叶以来的很多历史场景，他的一生是富有传奇性的，在我们这些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看来尤其如此。

唐先生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文字，内容是在社科院历史所那几年的事情，时间范围比较短。我们曾劝唐先生写部内容更广的回忆录，特别是早年经历和求学过程，他也觉得可以写写，不过没有真正成文。前年唐先生说，他现在眼睛越来越不好，写不了东西了，希望我去他们家，他讲一讲，让我来做录音和整理。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，计划好了每个周末去半天，不过后来因为别的缘故，没能实行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对我们这些后辈，唐先生说得最多的，是鼓励我们做研究、写论文。每次去看望，他都会谆谆叮嘱我们这件事；听说我们当中谁又发表了论文、出版了新书，他就很高兴。我印象最深的是 2013 年春节前的一番谈话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在那年夏天召开规模宏大的学术研讨会，以纪念学会成立三十周年，唐先生打算参会，国图的几位学会理事也都收到了会议邀请。春节前我陪同林世田老师去拜访，唐先生再三讲：今年学会的纪念会，一定要写文章，有文章人家才看得起我们。

我们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，主要工作是敦煌学学术服务，包括阅览、咨询、数字化、目录索引编纂以及举办讲座、学术活动等等。敦煌文献组本身并不是一个研究机构，也没有专职的研究岗位，主要业务工作都是围绕学术服务进行的。当然，要做好学术服务工作，就必须要对敦煌学界的动态有所了解，要对学者们的需求有切身的体会，要对学术工具有熟练的掌握。这些信息和技巧，如果不是亲手做一点研究工作，是很难熟练掌握的。因此，为了提高服务能力、做好服务工作，为了能和敦煌学界开展交流，同时也是为了提升、充实自己，我们这些整天淹没在事务性工作中的图书馆员，也必须挤出点时间做点文献研究、写写学术论文。

在我们敦煌组，唐先生是学术成就最高的前辈。他是 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时联名向中央上书的 22 位老专家之一，他们为学会和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支持，对八九十年代敦煌学的腾飞有很大的推动。更重要的是，唐先生完成了几部功力深湛、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，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典范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非常差，连看缩微胶卷的设备都很难找得到。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唐先生完成了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全五辑，完成了《敦煌法制文书》，以及一系列敦煌会计文书的研究论文。社会经济文书是敦煌文献中状态最差、书写最随意、俗字最多因而整理研究难度最高的部分，唐先生不惜损耗健康，多年孜孜以求，取得了享誉世界敦煌学界的成就。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一书，已经成为博士论文

和学术专著的研究对象（吴蕴慧著：《〈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〉研究》，新北：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，2013），其贡献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。

即使到了晚年，唐先生依然学而不倦。去他家拜访时，很多次看到书桌上仍然摆着书和稿纸。印象比较深刻的，是2012年春节前，看到他书桌上打开的是《三国志》和《资治通鉴》。他也始终惦念着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，有两三次跟我谈到，文书中有关于唐五代民间习惯法和民俗的内容，值得挖掘研究，似乎他仍在构思一篇新的学术论文。

唐先生的言传身教，给了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。我常常想起唐先生的话，告诫自己不要满足于完成业务工作，更要努力提升自己。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着台灯打开电脑，看看资料或者写点什么，心里才感觉到踏实。每次收到学术会的邀请，唐先生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，因此只有准备好了论文我才敢出去开会。虽然论文可能写得不好，但总得提交一篇，努力过之后心里才少些愧疚。

算起来唐先生在敦煌组工作的时间并不长，只有3年多而已，不过他的影响却是长期的，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这样的。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，感染、鼓舞了后来者。唐先生对国图感情也很深，他晚年把自己留存的名家书信，都捐赠给了国图古籍馆的名家手稿文库；他的代表作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及几篇重要论文的手稿等，也在去世之后由家人捐赠给了国图。

应郑炳林老师的热心安排，几年前唐先生整理了自己的学术论文，编成一个集子，交给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，准备作为“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”之一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这些论文很多是手写发表的，加之录文中俗字非常多，整理排版的工作难度很大，因此出版进程比较慢。期待这本书能在近期出版，以完成唐先生的最后心愿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